



香港 晚来一百年

长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晚来**香**港一百年

长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来香港一百年/长江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086 - 3

I. 晚… II. 长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5759 号

责任编辑:杨新岚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晚来香港一百年

Wan Lai Xiang Gang Yi Bai Nian

长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1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0.75 插页 2
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086 - 3

定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慧眼只须顾盼间

——序长江《晚来香港一百年》

陈建功

长江的名字我并不陌生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对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很深的印象。后来居然是在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的荧屏上把这位长江“验明正身”——原来时下这位红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长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长江。长江犀利的采访风格和雄健的思辨力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忽然她似乎又销声匿迹了。未及探明原因，却在《当代》上看到了她的报告文学新作《矿难如麻》。不久，在第三届“鲁迅文学奖”的报送篇目中，再次读到长江的这篇作品。直至晚近又从《当代》杂志上读到《晚来香港一百年》的连载，才知道长江被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，才知道她仍然坚持着“职业之外”的写作。

然而，至今也不曾与长江谋面，甚至连电话也没通过。

朋友将长江准备结集出版的《晚来香港一百年》清样送给我，请我写序。这颇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。对这位作家的才情与胆识，固然是敬重的，但细细一想，对她的创作道路，所知也不过是流萤般划过的一些踪迹而已，岂敢担此重任？不过把长江的这些随笔读过后，倒被这位作家开阔的视野、敏捷的思考和活泼辛辣的文笔所征服，想不说似乎还欲罢不能了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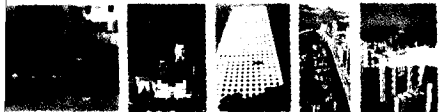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这部结集作品的开篇是“在香港‘咋’做记者”。开篇便以生动的细节，把我带进了文化比较的视界。内地和香港，同文同



种,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、发展背景的区别,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。难得的是,长江以其独有的记者的敏锐,捕捉到了这种差异。更难得的是,长江更以一个作家的深刻自省,体悟这种文化差异背后的东西。换言之,读这篇作品,我敬重她对记者职业的热爱和激情,更钦佩她在“热爱与激情”后面的冷峻。由此我想几乎可以武断地声称找到解读本书魅力独具的钥匙了——记者的敏锐使五光十色的香港扑面而来,趣味横生。作家的感悟又使凝重深沉的思绪绵延而去,意蕴绵长。

长江笔下的香港的确是趣味横生的。比如香港公共卫生间之洁净,备用手纸之理所当然,大概还没有哪位香港作家为之惊诧。然而到了长江笔下,真是作足了一篇启人心智的大文章。又比如吐痰入纸、垃圾入筒、杂物入屋,巴士排队、如厕排队、游泳排队,等等,直说到马路口为盲人过街提示的当当声、“天星”小轮上可掉转方向的座椅、人手一卡的“八达通”……对于香港人来说,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,长江却把它们述说得有滋有味。捧读这部作品,一边兴致盎然地听她讲“景儿”,一边反省自己也曾几度游历香港,咋就没有这般敏锐的触角,更没有这般“说演荣国府”的才情。我想,这应该得力于她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养成,也得力于“刘姥姥”进“大观园”的“文化震惊”,更仰赖其开放的宽容的文化学理念。对内地和香港,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,因此,书中没有必要做权衡利弊的政治考量,也没有必要做礼貌周全的左右逢源。本书中,毫不讳言内地某些方面的不足与落后,然而这中间不温不火,洋溢着对社会进程的理解和期待。对香港,也不尽然是一味讴歌,有时甚至还有几分调侃。比如作者写到香港人真能“整景儿”,调侃得令人忍俊不禁——港府的“城市绿洲”项目,“社会意义”如何如何、“经济意义”如何如何、“环境意义”如何如何,再加上富有诗意的《绿洲号外》,吊足了记者的胃口,临前一看,不过是夹在高楼大厦中间一小块一小块整治的草坪。对于来自广袤的内





地的作者来说,她是不能不哑然失笑的,也不能不发出一句调侃:“唉,香港人真能整景儿!”然而,作家调侃过后的感慨却令人感动,她感悟到,“绿洲”之称实在是人烟稠密的香港民众对绿色的期待,侍弄这片“城市绿洲”的小区居民自愿组成的“绿壮士义工行列”也显得格外悲壮起来。作者说,“香港人真能整景儿”,这句话到了后来,我渐渐放弃了开始的轻视,另一样东西漫卷而上——敬仰。应该说,读到这里,我对这位作家也“敬仰”起来,我敬仰她调侃的直率,也敬仰她放弃那调侃的坦诚。她的直率和坦诚里有文化的惊异和理解,还有文化的谦虚与善意。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属于长江,也属于开放时代的中国人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本书,是一本探究香港生活、拓展我们视野的书,也是一本磨洗我们的心性,让我们好奇、开心、谦虚、向善的书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元旦



目 录

慧眼只须顾盼间(序) 陈建功 1

第一章 1

在香港“咋”做记者? / 两地记者“异同”何在? /
“特首”就在我身边? / 严肃和“嘴巴”无关? / 鹅颈
桥下“打小人”? / “古墓”就在家门口? / “科学”与
“风水”鹿死谁手?

第二章 40

“叮当车”带来了多久的风? / 香港为什么不“堵
车”? / 这里“撞死了人白撞”? / 一般人住多大的
房子? / 香港人怎么去“看病”? / 生了孩子“养”不
起? / 老了香港人会去“哪儿”? / 手机也不是“单
项”收费? / 香港有没有“黑社会”?

第三章 82

谁愿意把“炸药包”抱在怀里? / “爱心大晒”不是
戏言? / 不能随便“学雷锋”? / 香港“法本位”? /
“法”前的大佬会输给农妇? / 名片=明骗? / “案
底”,压死人的一顶帽子? / 谁来制约“法官”?

第四章 110

香港还是“臭港”？ / 在香港怎么去“方便”？ / 香港人为什么“晒”不黑？ / 满耳朵“锤声”烦不烦？ / “天星小轮”有多老的故事？ / 你会到银行“取钱”吗？ / “人性化”的思想从哪里来？ / 香港最早“八达通”？

第五章 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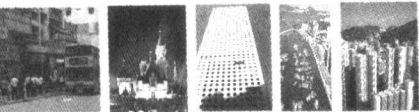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何处不“排队”？ / 偏不“入乡随俗”你试试？ / “罚”出来的满岛规矩？ / 一则“广告”要告诉我什么？ / “菲佣”是什么样的小保姆？ / “巴士阿叔”怎么会出现在香港？ / “碧姐的故事”也会把世界震翻？ / 曾宪梓干吗要如此“痴情”？

第六章 172

什么是香港的“本能”？ / 香港人“真能整景儿”？ / “倒移民”的滋味儿谁知道？ / 生命在于“紧张和竞争”？ / “荷李活”根在“好莱坞”？ / “牙牙学语”怎么不行？ / 老人“学普”干什么？ / 谁敢说“吃在香港”？

第七章 209

“派米”？ / “白加道”意味着什么？ / “铁皮房”都在楼顶？ / “金屋藏娇”在黄宫？ / 大学“捧”在大佬儿的手里？ / 香港才“富”了30年？ / “天光墟”诗意何在？ / “笼屋”你究竟在哪儿？ / 谁真的认识“李嘉诚”？ / 田家炳干吗要重归“平民”？



第八章 253

巴士司机要“罢工”？ / “公屋婆婆玩残政府”？ /
“域多利”仅仅是一座监狱？ / 香港政府有“多大”？
/ “立法会”好厉害？ / “5号报告”何以流产？ / 梁
爱诗自己“打车”走了？ / 梁锦松是怎么“下台”的？
/ “媒体”更厉害？

第九章 284

咱还能让人给“八卦”了去？ / 一人偷拍、全体偷
看？ / “赌马”和慈善连在一起？ / 敢不敢走近“红
灯区”？ / 上街“有瘾”？ / “交换文化”有什么不好？
/ 香港有张“月亮”的脸？ / “自由行”给你我带来了
什么？ / “拆了墙”咱不更是一家？

后记 322



第一章

香港人管“走”叫“行”。

满世界“走走”就是满世界“行行”(发“hang”音,且为第三声)。

2004年9月,中央电视台派出了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,我是其中之一,“行”入香港。作为传媒中人,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,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,工作之余,举凡有空儿,我是总喜欢这里看看,那里瞧瞧,像只小鸟儿,兴奋地不断扇动小翅——

然而,香港毕竟有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,中西合璧、亦古亦洋,前人诸子早把这颗“东方明珠”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,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,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,那可不是件易事。果然,到港的头半年,我只字未成。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,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《新闻调查》栏目小坐,老同事久未见面,一抬头“哟,姐回来了”?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:“香港人民可好?”“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,粤菜,能行?”“说正经的,姐,您在香港咋做记者?还跟过去在‘调查’一样吗?”……我心有所动,这个“动”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的一点都没障碍,而是大伙最后的那个非正式的问题——在香港咋做记者?一个“咋”字可惹了祸,碰着我内心的一块肿胀,立刻,辛辛苦辣辣、酸酸甜甜,许多东西都往外冒,直到返回香港,拉拉杂杂地还没完没了,这下手指头可有点难受,就坐到了电脑前,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戳点……



在香港“咋”做记者？

一个内地人到香港“咋”做记者？

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？

说句欠谦虚的话，来这个地方前，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“雏儿”——1996年，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，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，每期45分钟，讲述一个故事，追究一个问题，揭露一起黑幕，被业界誉为“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”，这就是《新闻调查》。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“航母”干了将近8年，同步读了6年“电视艺术”的研究生，再早还在报纸、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、编导、记者、主持人都做了个遍，资历、学历可谓不浅。然而到了香港，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：陌生、尴尬、混乱、无奈，触到“咋做记者”这个话题，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——“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”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，你扛

着机器外出一次，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——

我的第一次“受屈”记得是在2004年9月底，那时初来乍到，两眼一抹黑，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，提前邀请我们前去采访。按



香港的区花——紫荆花

照内地的习惯,新闻记者,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,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,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。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,门前不仅没人等待,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,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,那标签儿上面



长江在香港做现场报道

用英文印着“记者”的字样,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。这个“记者区”很临时、很简约,就是十来米见方的一个木头台子,高有一尺,一面靠墙,三面都用绳子拦着。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,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,样子既好看又体面。但是“红绳”是专门用来“圈”人的,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“红绳”一步。开始我不懂,也不是眼馋着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(也和记者无关),只是台子太小,媒体太多,摆不开机器,就试探着出来,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。谁知我的腿刚刚迈过“红绳”,工作人员就急忙跑过来,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:“快快,快请回到记者区,你们不能出来!”我登时傻眼,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……我们可不是来蹭饭,而是你们事先……然而容不得我申辩,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“推”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,这下,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,当场就被拍成了一块碎木炭,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,根本拾不起尊严——看来香港记者台的“红绳”还真的并非虚设,是唐僧给“孙猴子”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。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以后长久都令我难忘。像什么?轰鸡?不错,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,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……



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，这个“地位”当然要加上“特殊”两个字才准确。而“特殊”，不管我喜不喜欢、承不承认，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。内地的媒体，不要说正面报道，就是《新闻调查》专事批评，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，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。现在虎落平阳，凛凛虎威荡然无存，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。就是进入寻常的日子，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，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“我是CCTV的”，说了，第一，很多人听不懂，第二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，是“中央电视监控”，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，到了香港才愕然，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。

2003年SARS期间，我曾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《走进淘大花园》的电视节目，当时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，但是临了，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，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，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，因为SARS以来，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，“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。”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，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“客串”一次，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，我要在这里常驻，要天天做新闻，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“红绳”的麻烦，总得思索个原因，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？

然而接下来，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，没有“抗争”。为什么？孤军奋战，“霸”徒劳，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“矫情”。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，



记者是个危险的职业

香港当地媒体诸如“有线”、“无线”、“亚视”、“凤凰”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，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。大家被一视同仁，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，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。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



等待是做记者需要的基本素质

立法及裁制肌体，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，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、拍摄，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，供天下的媒体采用，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，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“某一家”的口实，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，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。此种“区情”香港媒体习以为常，他们不仅对各种“特权”不存奢望，而且面对“红绳”，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。

过去CCTV常驻香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，1992年他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，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，媒体都在“下亚厘毕道”政府总部等结果。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，拿着矿泉水，心里好笑：“这是干吗呀？一会儿采访结束，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？”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，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外面“没脾气”地等，饿了就撕面包，渴了就喝矿泉水，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：“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？”这位“老前辈”心里窝囊，离开吧，怕误了新闻；不离开，又饥渴难耐。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、

一派自然,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其深沉的感慨:“不一样!处境不同啊!香港的记者敬业,或者说职业,他们每天东跑西颠、忍饥挨饿,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!”

不知道什么是“委屈”就是“敬业”?就显得“职业”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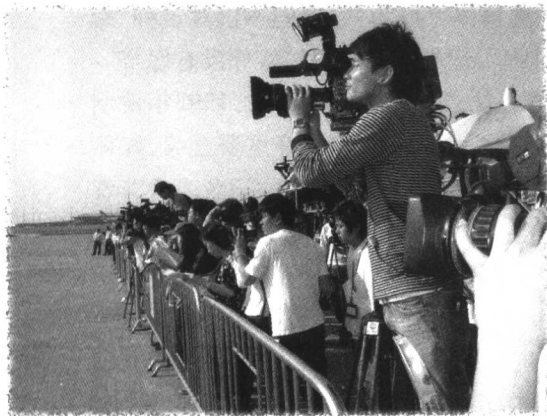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前辈”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“内地的”有什么不同,这种“观察”实际上我明白,已经等同我对“红绳”免战高悬……

两地记者“异同”何在?

同样面对“红绳”,我受不了,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?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观察、琢磨,最后基本认定是心态。

“心态”,这东西不是表格,不是图画,怎么量化?所谓: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”

内地记者使命神圣,肩负重任,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,身



香港记者在室外采访拍摄

上没有什么优越感;而从内里来说,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“无冕之王”,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,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;然而香港的记者则不同,在他们眼里,从事媒体传播,那只不过是社会种种职业当中的一种,

没有什么高低贵贱，假使有，至少不高。这一比就出了反差。

可是内地记者身上特“牛×”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初到香港，我还没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，就是有，人家是当地人，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。于是只有自我反省。想来想

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，自忖无非身怀二气：豪气、官气。这两种“气”不分次序，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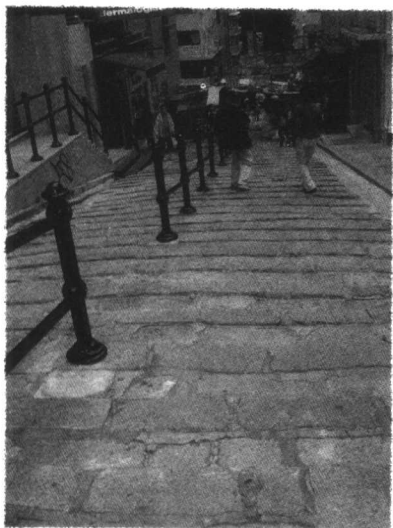
先说“豪气”。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不到三年，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，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“崇高”的社会地位，每个记者外出，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“为民请命”、“替天行道”的伟大胸怀，而我在内地的20年，做惯了“社会良知”、“匕首和刀枪”，心中总有一面战旗，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：“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，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，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，并及时发出警报。”一个新闻工作者，不管在任何社会，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、针砭时弊、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？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？他们不熟悉“普利策”吗？事实上，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。

再说“官气”。我在香港，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太不给传媒人面子，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，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“钦差大



香港记者被拦在“红绳”内并不觉得委屈





香港百年老街道

臣”。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“官气”，《新闻调查》工作的8年，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个“田野记者”，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，什么“味儿”？医生长久地在医院里工作，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满身药水，可是一到了外面，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

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，非要活捉萨达姆，找出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。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，内地人认识了“凤凰卫视”的一位年轻姑娘——吕露露薇，而我到了香港，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“吕

邱”，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，日常工作却很平凡：发现新闻、抢到新闻，第一速度、第二详细。

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，活动快要结束了，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。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，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，那地方是楼梯，露天的、麻花儿一样的旋转，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，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，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，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，那阵势



听说你换了男朋友

